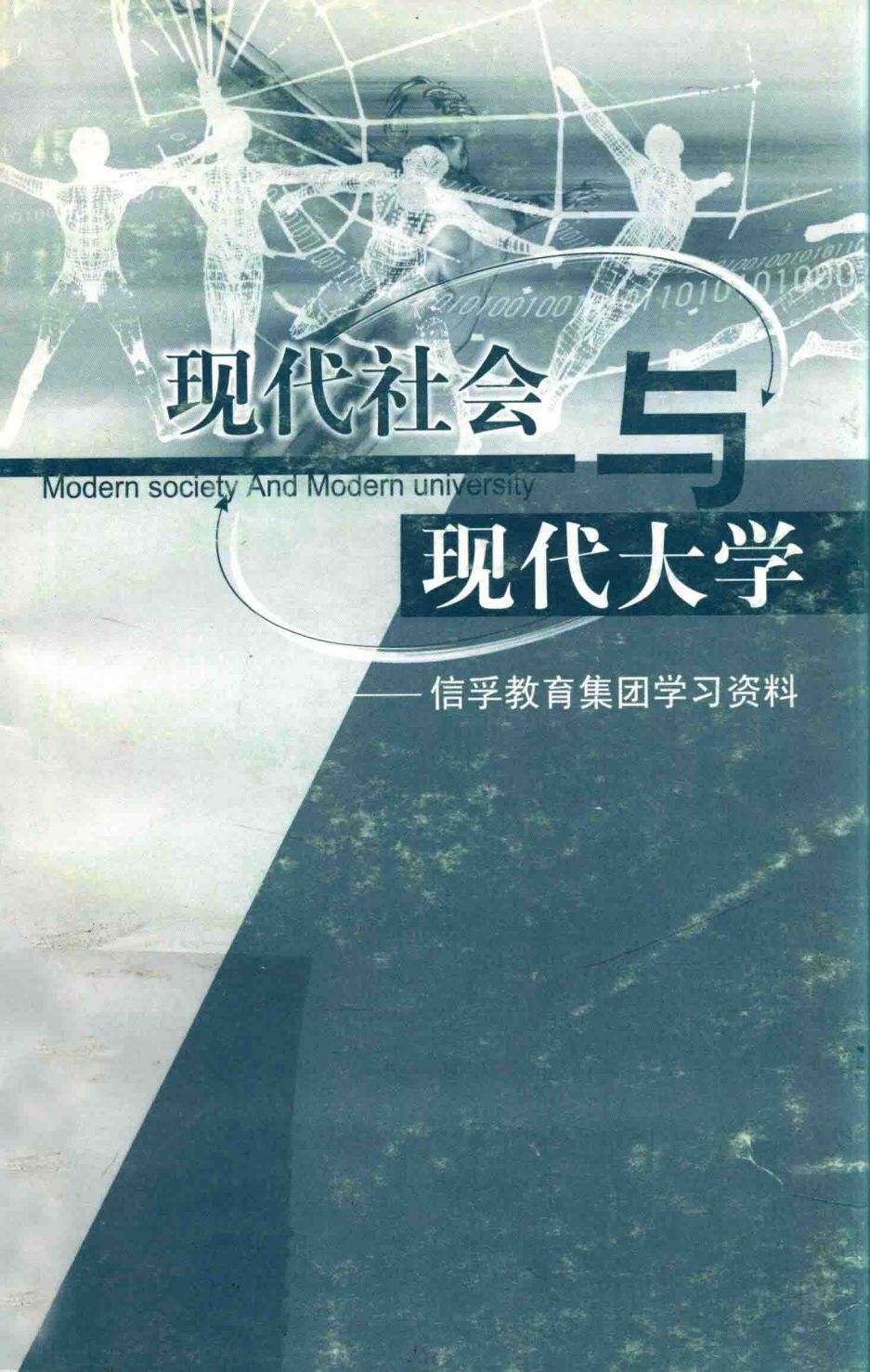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collage of digital and human elements. At the top, several stylized human figures are depicted, their bodies composed of a grid of small squares, resembling wireframe models. They are positioned as if interacting with a network of glowing lines and nodes. Binary code (0s and 1s) i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A large, dark, curved shape, possibly a stylized 'C' or a swoosh,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greys, and whites, with some greenish-yellow highlights.

现代社会与

Modern society And Modern university

现代大学

——信孚教育集团学习资料

信孚教育

一个中心：以普世价值（真、善、美、爱、慧）为我们的追求目标

两项基本点：教育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方法

开凿石头是劳动

打磨石头是技术

建造宫殿是知识

坐进宫殿是成功

宫殿里发生的，是现实

宫殿倒下了，散落地面的，是历史

仍然保留下来的，是文化

认识历史、掌握文化，就是智慧

前 言

在中国,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是我们魂牵梦萦、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归根到底是公民素质和制度的文明来决定的。只有繁荣的经济而没有昌盛的教育和文化与之对应,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就称不上“全面小康”,就称不上实现现代化,就称不上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精神文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即使成功也只能是短暂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必定能在当今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崛起而成为普世文明,而高度文明的实现,最后还是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改革。

目前,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少,如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浪费、学校管理滞后、教学质量有待提高、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教育亟须改进和加强……纠缠中国教育的这许多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凸显出来,直接影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本书中我们编选了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有关大学改革的对话和广东省社科院李江涛教授有关现代社会体制的文章,旨在使我们的老师了解当前的改革形势。教育事业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改革息息相关的,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政府要自觉的接受人民的监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有力举措。同时,我国的教育改革,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教育缺钱、缺政策、缺规划的状况何时能够改变,中国教育能否度过难关,中国教育能否大有作为,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信孚教育集团编辑部

2004 年 3 月

目 录

现代大学

——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谈话录 张维迎(1)

现代社会..... 李江涛(55)

“公仆”理论与授权关系 (55)

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 (59)

公民权利与宪法精神 (62)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65)

坚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重 (68)

论社会摩擦成本 (71)

民主政治及其边界 (73)

提高政治运作专业化水平 (76)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79)

政治建设中的竞争机制 (84)

政治文化建设基本原则 (87)

政治运作程序化 (90)

现代大学

——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谈话录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郭沫若《女神》序诗（1921 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1992 年）

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危机感，要有改革的勇气，要有改革的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

我觉得教育部长也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而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

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中国其他大学的改革。

——张维迎(2003年)

—

编者按

半年以来,有关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热闹非凡,众多新闻媒介给予特别关注,甚至许多海外华人也参与讨论。

中国伟大的改革进程正向纵深推进。继竞争性经济领域改革之后,改革正向垄断领域、事业(社会)领域乃至公共领域等方面延伸;大学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正成为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龙希成邀请赵晓博士,就大学的逻辑、大学的理念以及大学改革的重要的深层次问题,共同采访了张维迎教授。张教授愿意以一个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从“公共理性”出发谈他的看法,所有观点均反映其个人见解。

我们期待讨论深入更加重要的层面和问题,并引发中国社会对于“后经济改革时代”诸多重要问题的建设性思考。

1. 以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

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

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你虽然有一个关于《方案》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着对《方案》和《说明》本身的误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有关大学及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有一种批评认为,你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您认为这种批评有道理吗?

张维迎:对改革方案有不同意见,这很自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方案的完善都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人们思考有关大学理念与大学体制更深层的问题。但有些误解还是有必要澄清。在我看来,北大这次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

也许由于我的学术背景,加上我在《说明》中有时把大学与企业作对比,有人误以为我们是用企业的逻辑改革北大。我很遗憾。其实,我想强调的正是大学与企业的不同,如为什么大学要有终身职位,而企业不能有。有些学科的教师对搞经济学的人不以为然,我能理解。但讨论改革方案是否合理,应该就方案本身讨论,而不应该因“人”废言。事实上,参与方案起草的人大部分不是学经济学的,而是搞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更不用说决策者了。

为什么说这次改革是以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这涉及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

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大学的这种理念不可能自动实现。实现这一理念最重要的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不是全部)。

我们必须承认,在总人口中,能担当起完成大学理念重任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如果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不能保证教师队伍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仅有学术自由是不够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这一点我们到后面详谈。北大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

我们认识到,尽管大学的理念与企业不同,但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大学与企业在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共性。比如说,无论学术界还是企业界,竞争都是选人和激励人的重要机制。我们不能因为企业用竞争的手段,就认为大学不能引入竞争,否则就是按企业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必须通过学术竞争来实现,这是学术自由的题中之义。

赵 晓:这次方案一推出,就引起了轰动;社会上的人有些惊讶:其中的背景是什么?是哪些原因促使北大要启动这次改革?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大启动这次改革是为了向政府要钱。

张维迎: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为了向政府要钱,最好不要改革,因为政府给钱并不以启动改革为条件。事实上,就财政支持而言,这次改革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北大推出的改革政府有关方面不高兴,到手的鸭子就可能要飞了。所以,改革不是为了要钱,因为给你再多的钱,如果你本身做不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个钱就白给了。如果仅仅是为了钱,就没有必要办大学,办一个公司就可以

了。当然,北大是全中国人的大学,国家对北大的支持很多,北大校领导有一种压力 and 责任感,北大要有一流的教师,要做出一流的研究成就。这在情理之中。

北大的改革其实并非突然。我们知道,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与大学的功能并不相容,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大学的理念。

我们通过考试制度可以招来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他们的创造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希望出国,到国外去拿博士学位?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提供能够满足我们的学生所期望的那种教学、研究的水准和环境。

许多人批评中国大学生“高分低能”。为什么“高分低能”?“高分低能”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师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研究能力。国外优秀大学的教师都在从事本学科最前沿问题的研究,他们能把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堂,把学生引导到学科前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但我们国内大学好多教师本人并不从事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根本不知道本学科的前沿是什么,上课只能用陈旧的教材(学术成果进入教材有一个滞后期),只能照本宣科。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走在科学前沿?怎么能有创造力?

另外,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出去的留学生滞留国外?据我所知,不少人还是想回来的。他们不回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或待遇的问题,而是有更深的原因,就是学术环境。我们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当学术气氛不能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天才也会被扼杀。尽管自1980年代始我们就不断谈论教育体制改革,但是应该说在一些最根本的方面没有大的触动,好多改革都是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 改革是实现大学理念的必由之路

赵 晓:你是说,要实现大学理念,必须对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包括哪些主要方面?

张维迎: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第一方面的问题是,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过于由政府主导,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大学办学的自主权非常小,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员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部都由政府规定。

赵 晓:这是一个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

张维迎: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因为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就低不就高,最后就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结果是所有的大学都向三流大学收敛,根本不可能办出真正的一流大学。

教授本来是大学的职位,大学水平不同,选聘教授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不应该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博士学位也应是大学授予的学位,而不应是政府授予的学位。在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教授职位和博士学位是通用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有效率的竞争,缺乏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竞争都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竞争。因为政府的资源是通过行政系统分配的,大学的资源是大学行政部门争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失衡,行政人员权力过大。

当然,政府对大学过度管制的问题并非中国特有,欧洲国家也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严重。但不论在哪里,政府管制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落后。两年前,耶鲁大学法学院汉斯曼教授写了一篇

文章,非常好。他问:大学本身起源于欧洲,欧洲的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甩在后面,成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包括欧洲的学者,都往美国跑?很多人说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能提供高工资,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汉斯曼教授认为,这并非主因。主因在于,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大学的严格的管制,导致大学之间没有竞争;而美国实行的是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

比如说工资制度,在英国,你是教授,不论你在牛津还是在爱丁堡,或是在很差的大学,工资都是一样的,教授就失去了上进心。在法国,当教授要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优秀的人不愿意经过这个考试,就跑到美国去了。这样的体制下,大学之间没有竞争,学术水平必然下降。而在美国,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大学都必须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在一流的大学找到工作,水平越高的学者得到的待遇也越高,学术水平自然就会提高。

政府管制必然导致大学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对大学提出的需求。我曾经思考:为什么欧洲最好的商学院基本上都在大学之外,而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一定在大学之内?我的答案是:美国的大学体制高度灵活,一旦社会产生了对管理教育的需求,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大学必须满足这种需求,商学院就会从传统大学应运而生。而欧洲僵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大学根本没法根据社会的需求设置新的专业,商学院只能在传统大学之外生长出来。法国的INSEAD是由哈佛的一些教授创办的,已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之一,但法国政府到现在也不承认它,因为它不满足政府规定的标准。

赵 晓: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大学体制:欧洲是政府管制型,美国是市场竞争型,中国是政府主导型?

张维迎:可以这样认为。但要注意,尽管欧洲有政府管制,但

因为欧洲的大学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大学本身对政府的管制还有一定的抗衡;而中国的大学因为缺少自治传统,所以就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特设机构。

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处长,可以随时召集大学的校长去开会,可以训令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没有一点办法,因为你的经费来源都是由他拨的,得罪不起。政府有关部门控制大学的办法之一,就是搞各种各样的评比,像重点学科评比、科研基地评比、跨世纪人才评比,等等。人人都知道这些评比劳民伤财,无聊之至,但谁也不敢不以为然,因为它们在大学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越是水平差的大学越是热衷于这些评比,迫使水平好一些的大学也不得不参与竞争;因为否则的话,别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你的脸面往哪放?校长怎么当?所以我说是三流大学跟着政府跑,一流大学跟着三流大学跑。但看看那些政府评出的所谓“国家重点学科”,有多少是真正代表中国大学最高水平的?

尽管《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有设立内部机构的自主权,但实际上做不到。北大在1999年改革之时,合并了一些部门,其中把社会科学部和科研部合并成一个部门,但有关部门就不高兴。你把社会科学部合并了,如果其他的大学都效法,那我以后干什么?所以你合并社会科学部,我就不给你科研经费,北大后来被迫又把它分开。

政府对大学管制过多,校长和教授们就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应付主管部门身上。为了应付主管部门,大学的官也就越来越多。

政府主管部门成天叫喊要建设一流大学,繁荣学术,其实阻碍学术进步的正是他们自己。中国真正要产生世界一流的大学,我想必须真正地、彻底地改变政府管制大学的方式,让大学自治,否则,一流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我当然不是说大学不应该有一些统

一的游戏规则,但游戏规则可以通过一些行业协会和学术组织,如大学联盟、大学教师联盟等等非政府组织去搞,而不应该由政府亲自来做。

赵 晓: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张维迎:我想就是大学内部体制本身的问题。内部体制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是政府管制的延伸,如行政主导学术的问题。

但大学内部体制最严重的问题是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一个人一旦当了教师,无论有无创造知识的能力,不论业绩表现如何,都可以工作到退休。而新教员的主要来源是本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留校,留校后当助教、提讲师、提副教授、提教授,整个大学内部形成千丝万缕的人际纽带,教师之间通常都是师徒关系、师兄弟关系,整个一个自我封闭的体制,大学完全“家族化”了。家族化的大学不仅有内部的等级体系,而且自然对外来的人有很强的排斥力,学术自由和平等的学术交流根本不可能。大家看过电视剧《刘老根》,一定明白打破家族管理是多么的困难。

在这种家族化的体制下,教师职务的晋升不可能不以论资排辈为主,就像家里娶媳妇一样,老大没有娶过,老二绝对不能娶,因为老二一娶就把老大给盖住了,老大就可能永远也娶不上。

提教授也是这样,先毕业的先提,然后慢慢再提后面的,反正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嘛。即使偶有杰出者,也只能“破格”提拔。这样,大家都形成一种预期,只要有耐性,退休前一定当教授。这样的激励机制,大学怎么能够吸引最优秀的人?怎么能够激励人们做出最优秀的研究成就?

大学教师等级化的一个表现是所谓的“科研梯队”,教授当学科带头人,讲师和副教授为教授当助手。教师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有了这种等级之后,处在高位置上的人什么都能说,处在低位置上的人只能听别人说,有思想也不敢顶撞,没有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大学的创造力都没有了。这样的体制,何以实现大学的

理念？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大学的封闭使得中国的每个大学都变成一个学术孤岛，形不成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评价教授的优劣非常困难，评价的权力只能交给政府，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大学的管制。

3. 不愿意改革的人没有资格担任大学校长

赵 晓：改革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涉及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涉及大学本身的治理结构。但过去所有的改革都是修修补补，在这两个层面都没有什么突破。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有所突破？

张维迎：对！北大过去其实做了很多改革，包括引进人才，1999年的九级岗位，起了很大作用。像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新进的教师基本上我们都是从外面引进的（包括海外和国内其他院校），我们已有好几年不留本院博士毕业生了。这样一来，学术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去年评教授，学校给光华三个名额，但光华只报了一个，因为我们的标准高，不论资排辈。

据我所知，北大的其他一些院系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是如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突破，就是一个教师一进来之后，他就终身了。

赵 晓：大学改革涉及诸多方面，但这次改革像是单兵突进；许多人不服气：为什么单单先从教师体制入手？

张维迎：这是改革学研究的问题。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必须稳中求进，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如果所有的改革同时推出，必然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欲速则不达。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有人说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准能动全身的这一“发”，先牵起来，而不能因为害怕动全身而不敢牵这一“发”。大家一定要把改革的目标和

改革的过程分开,改革的过程只要有助于达到最后的目标,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教师体制作作为突破口,我理解,第一,因为教师毕竟是大学里最重要的资源,是实现大学理念的源泉。如果教师的质量上不去,其他的如行政服务、后勤服务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可以去看企业的行政后勤都做得很好,但它不能为人类创造知识。

教师体制晚改一年,就会有一些新的不合格的教师被提拔,以后改革就更为困难。所以早改比晚改好。

第二,教师体制的改革将创造对其他方面改革的强烈需求,从而会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包括学校行政和后勤体制的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科研资金分配体制的改革,大学决策体制的改革,干部任命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些我们到后面将详细讨论。这次讨论中大家提出这么多问题,恰恰证明教师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你想,如果率先推出的是行政人员的改革,而不是教师的改革,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吗?能引起大家对大学理念的追问和反思吗?

至于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但是坦率讲,学校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呼吁,但不具可操作性,只能等待教育部出面来做。但我相信,北大的改革,对改革政府管理大学的方法本身提出了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总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

赵 晓:改革教师体制,让教师流动起来,就要求其他大学对北大的教师开放。如果其他大学不跟进改革,北大改革就很难成功。

张维迎:对改革的要求每个大学都有,问题是谁先迈出这一步。我相信,其他的大学,像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等,都会进行类似的改革。试想,中国如果有十

几所主要的大学开始类似的改革,那将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多大的活力!

退一步讲,即使其他大学不马上跟进,按照现在的方案,北大至少有三年时间等待。难道三年之后他们也不跟进吗?事实上,像中山大学已经开始改了,其他大学也正在展开不同程度的改革,只是没有北大彻底罢了。所以这次媒体“炒”北大改革,有些大学很不服气。

教育部门不仅应该支持这个改革,而且应该就其职权范围之内,真正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把大学真正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单位;像设什么样的学位、教什么课程、招多少学生等等事项,都应该是大学自主决定的事。

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一个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他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对教育部门也是这样,我觉得教育部长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其他的大学的改革。

二

编者按:

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改革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但改革的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制度都只能针对通例和一般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可以针对特例设计特殊规定减少缺陷。